

# 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 以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為例

邱 坤 玄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黃 鴻 博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 摘 要

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權力增長、利益擴展與責任增加的同步發展過程。中國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提出並實踐「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然而，中國是否真的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呢？其對外的宣示與實際作為是否一致呢？這些問題必須透過檢驗才能夠得到答案。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是最敏感的安全領域，也是研判中國對於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最佳場域。本文嘗試從建構主義的角度出發，探討中國對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塑造方式、國家身分轉變過程、轉變原因及合作質量，並據以研判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身分認同程度。

**關鍵詞：**規範、身分認同、負責任大國形象、裁軍與軍備管制、國家利益

\* \* \*

## 壹、前 言

自 1980 年代晚期以來，中國本身及西方世界廣為討論的議題是，對於擁有光榮的過去與模糊國家身分認同的中國，其最適合當代何種世界角色？<sup>①</sup>中國建政以來，相對於國際社會的國家身分認同幾經變換，在國際結構的制約下，歷經「社會主義大家庭

---

註① Peter Van Ness,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 154.

的一員」、「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及「負責任的大國」等四種身分定位。<sup>②</sup>尤其在冷戰結束後，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崛起後的身分認同及其在國際上的行為表現，自然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持平而論，中國的崛起是一個權力、利益與責任的同步發展過程。利益的擴展必然促使相對責任的增長，而責任的增加又自然會要求相應的權力地位；權力地位的提升一方面增強了承擔責任、履行義務的能力，同時也強化了承擔國際責任的意願。過去中國對國際多邊組織或建制是明顯存有戒心，擔心可能會限制主權與獨立行動之自由，但當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多邊環境中保護本身的主權利益時，中國已認知到多邊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政治效益（political utility），故而向其他國家一再保證，中國崛起的本質及作為負責任的國際成員的承諾，<sup>③</sup>是以，中國自 1990 年代中期開始提出「做國際社會中負責任大國」的外交理念，並在外交實踐中開啓了負責任大國的身分建構。<sup>④</sup>此宣示說明了在中國崛起過程中，隨著實力的提升與融入國際社會步伐的加快，使得中國對自己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角色、擁有權力、承擔的國際義務和責任的認知開始發

註② 肖歡容，「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地區主義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46-47。

註③ 樂為良、黃裕美譯，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著，*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的中國強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頁 172。

註④ 西方學者對此理念的觀察，以 Evan S. Medeiros 與 M. Taylor Fravel 的論述較具代表性，強調自 19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加入了各項貿易及安全協定，深化了對主要多邊組織的參與，並且協助處理全球性安全問題。同時，外交政策的決策已較少個人化且更制度化，而中國外交官在闡述本國的目標方面也變得更細緻化（sophisticated）。更廣泛地說，中國外交政策機構（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已開始把本國視為是一個具有各種利益並負有各種責任的新興強國，而不是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那個作為受害者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學者則普遍認為 1990 年代中期，由於國際局勢有所緩和，中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加強了與國際社會的互動，並且積極參與多邊外交，使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開始承擔更多責任。亦即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與對外交往的擴展，中國已產生較強的國際責任意識，這種初備的責任意識也常隱含在中國領導人對外言論中（例如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在 1995 年 10 月 24 日聯合國成立 50 週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強調中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充分意識到自己肩負的重大國際責任……，中國廣泛參與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邊經濟和社會領域的活動。我們積極評價聯合國及其有關機構對中國經濟建設給予的幫助，同時我們也為促進國際間的經濟與社會合作貢獻了自己的力量），而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是中國的負責任大國理念全面形成之重要契機和關鍵推動力，中國擺脫了傳統政治文化思想中對權力的負向價值判斷，以及缺乏承認自身大國地位和行使大國權力的政治意願之影響，此後「負責任大國」就成為中國政府在很多重要場合為自己公開界定的身分，也成為中國進行外交實踐的基本理念依據之一。Evan S. Medeiros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 December 2003), p. 23; 李寶俊、徐正源，「冷戰後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的建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1 期（2006 年），頁 49-50；牛海彬，「『中國責任論』析論」，*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3 期（2007 年），頁 48；李慧明，「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國：當代中國的身分訴求與實踐建構」，*國際關係學院學報*（北京），第 1 期（2008 年），頁 26；徐正源，「權力與責任：冷戰後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的建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主編，*復旦國際關係評論第 8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4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1996 年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頁 714-715。

生巨大變化。事實上，在 GDP、GNP 以及軍事力量等物質性國力快速增長之時，中國學界也開始體會出社會性成長的重要性，認為物質性成長是大國崛起的基礎，也是大國成長的必經階段，但任何大國的成長並不只是物質性成長邏輯，在大國成長的中後期，社會性成長邏輯將越來越佔據大國戰略目標的主要地位，其中，大國形象在社會性成長邏輯與結構中佔據的分量越來越大，成為大國崛起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的重要標誌。<sup>⑤</sup>

然而，中國是否真的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呢？其對外的宣示與實際作為是否一致呢？這些問題必須透過檢驗才能夠得到答案。遺憾的是，目前國際社會對「什麼是負責任大國」，並沒有一套統一的評價標準。按照中國前外交學院院長吳健民的看法，中國的責任表現在四個方面：（1）要辦好中國的事情。中國是一個擁有 13 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事情辦好了，本身就是盡到自己的責任，也是對人類的貢獻；（2）履行《聯合國憲章》、國際法準則和已加入的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義務；（3）履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的義務。凡是有利於世界和平與促進發展的事，我們就積極去做；（4）人類面臨著嚴峻的共同挑戰，這些挑戰是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單獨應對的，必須聯合起來。中國當然要在這個過程中盡到自己的責任。<sup>⑥</sup>顯然地，前述的第一點是屬於國內層次的範疇，是每個國家本來就應有的責任，而後三點則是隨著中國崛起後的權力增長、利益擴展與責任增加過程中所應善盡的國際責任，其中明顯帶有濃厚的道德意涵。

就美國而言，誠然，中國的崛起是一個事實，但其所在意的是中國如何運用其逐漸成長的影響力問題。中國基本上是現有國際體系的受益者，從中國近年來在國際上的表現，可以看出其並無意改變國際體系的遊戲規則，但美國仍擔心崛起的中國是否會削弱這個體系。<sup>⑦</sup> 2005 年 9 月 21 日，美國前助理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演講中，所提出的希望中國成為國際體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概念，就是對這種不確定性的具體反應與對策。他強調「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的參與者，中國不僅僅是一個成員，而且應與我們共同努

註⑤ 中國學者郭樹勇認為所謂「大國形象」，其實就是國際政治社會化反映在大國上的一種映象，是一種以國家間認同為依託的單位認同，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指涉的是國際社會中一個大國應該具有的良好精神面貌與政治聲譽，它是一種理想目標，是國際社會從時代精神角度賦予大國的各種義務、責任。換言之，它並不是一個具體言盡的概念，也不是一個已經實現的事實，而是國際社會對大國的道義要求與精神認同，是一種社會建構，是國際社會對某一大國之所作所為與言語活動之普遍的觀念反映，這種反映在某一個時段的沉澱，即是這個國家的國家形象，而國際社會對一個時代的所有大國的理想要求，就是這個時代國際社會的大國形象。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1-93、236-237。

註⑥ 轉引自秦亞青、朱立群等譯，Bruce Jones and Carlos Pascual 著，*權力與責任：構建跨國威脅時代的國際秩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中文版序，頁 3-4。

註⑦ 樂為良、黃裕美譯，前引書，頁 175。

力維護使之獲得成功的國際體系」，<sup>⑧</sup>由此不僅表露出美國對中國如何運用其影響力的疑慮，亦凸顯出美國期待崛起的中國能善盡其共同維護現有國際體系的責任。

巧合的是，美國學者們於 2006 年末至 2009 年初，融合國內兩黨智庫人員的國內諮詢小組與吸納跨國智慧的國際諮詢小組，完成了一項名為「治理全球不安全因素」的課題研究，並出版了研究成果—*權力與責任：構建跨國威脅時代的國際秩序*乙書，希望藉以啟動全球安全體系的改革。此研究正式提出「負責任主權」概念，企盼各國重新界定主權以承擔責任，這些責任包括國家對自己公民的責任、對其他國家的責任以及對國內行為所導致的外部性後果的責任，並且希望各國將「相互負責」當作重建和擴展國際秩序基礎的核心原則、作為國家替本國國民提供福祉的核心原則。<sup>⑨</sup>前述的負責任主權概念與吳健民提出的責任觀似乎有某種程度上的趨同性，表露出中、美雙方在此議題上逐漸具有共同關注的焦點；此外，亦顯示出負責任大國的實踐具有順應世界潮流趨勢的意涵，是中國必須不可迴避的課題。顯然地，雙方都認知到全球化帶來的一個深刻的事實是：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高度相互依賴，已經不能分割。對多數國家而言，恐怖主義、氣候變遷、武器擴散、跨國犯罪、環境惡化、流行疾病、毒品等問題都說明了一點：要與國際組織建立夥伴關係、要遵守國際組織或建制的規則與規範。簡言之，沒有持續的國際合作是無法應對這類威脅的。在此認知下，本文檢驗中國的負責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外交實踐之分析層次，很自然地落在國際組織或建制上，用以探討中國的政策宣示與實際行為表現是否相符。

目前全球性的國際組織或建制主要包括：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構成的國際經濟建制；由聯合國安理會決策建制、聯合國維和建制及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等構成的國際政治與安全建制。本研究囿於篇幅所限，無法一一論述中國在前述國際組織或建制的行為表現，僅能擇一代表性議題進行重點研究，其中，裁軍與軍備管制是傳統上攸關國家安全的最敏感領域，也應是研判中國對於負責

註⑧ Robert B. Zoellick, "W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註⑨ 該研究強調「主權」是因為國家仍然是國際體系中的主要行為體，若無有效的負責任國家，則很難解決任何重大的國際問題。此外，本文視「負責任主權」概念為負責任大國的「理念類型」(ideal type)，以利於觀察和比較事例與論述，但事實上，長期完全符合此概念標準的國家幾乎是不存在於現實世界。本文的「負責任大國」概念，係假設國際環境不同程度地存在某種秩序，此種秩序的維持和推展，對大國而言是可能且值得追求的，追求的方式依照制度化的程度不同，包括大國協調、主要大國和新興大國之間的制度化合作，或有強制性的國際體制。大國對上述國際秩序的保障與改進作用大，正常的和負責的大國將認同且促進上述過程，而不會在僅考慮綜合國力的得失和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下加以破壞。冷戰結束後，日益強大的全球化相互依存趨勢與國際議題的多元、專業分化，都需要大國間相互協調合作，當然現實過程中也可能提出改革程序的意見（如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新秩序一直是中國追求的國際責任目標之一），或者出現主導國際體系的大國因單邊使用權力而引起眾怒和抵制或不參加普遍受到各國認同的國際條約（如美國在 2003 年出兵伊拉克及不參加《渥太華禁雷公約》等），但基本上仍以妥協合作的表現為主。參見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8 期（2004 年），頁 78；秦亞青、朱立群等譯，前引書，頁 8~9、61；李寶俊、徐正源，前引文，頁 52。

任大國身分建構與實踐的最好指標，故而成爲本文的研究對象。本文研究重點著重於兩個面向：一是分析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是否對中國產生規範擴散效應？二是分析中國在上述領域的表現是否顯露出負責任大國的行爲，以及其國家身分的認同程度爲何？在此研究範疇下，本文的基本假設是：中國參與國際裁軍及軍備管制建制的行爲轉變，是規範與現實下的抉擇，規範改變了其國家身分的認同與國家利益，並直接反映在各階段的對外行爲上，但中國的行爲表現同時也受到了國際現實環境的制約，亦即是學習與調適下的結果；在實踐上，較特殊的是中國會透過約束自己或自我預先承諾的方式，彰顯其負責任大國的形象。<sup>⑩</sup>

最後，在理論與分析架構上，本文從建構主義的理論角度出發，採用規範、身分認同、國家利益與行爲的概念，並運用秦亞青教授的「國際社會與國家身分」分析架構爲主軸，以中國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爲操作載體，論證中國身分轉變過程、轉變原因及合作質量，並據以研判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身分認同程度。此外，在研究安全議題時，通常會遇到制度、機制、建制與組織等名詞混淆問題，爲避免爭議，本文統一使用「建制」(regime) 乙詞，<sup>⑪</sup>另裁軍與軍備管制所涉及之相關專有名詞，兩岸在翻譯上略有不同，在運用上本文以國內說法爲主，中國爲輔。

註 ⑩ 在探討國際規範與國內結構的關係以及國家行爲體的能動作用時，Jeffrey T. Checkel 提出了「文化匹配」(cultural match) 的概念。他將其定義爲：「一種鑲嵌在國際規範中的規定與國內規範一致的情境，通常反映在論述或司法制度中」(a situation where the prescriptions embodied in an international norm are convergent with domestic norms, as reflected in discourse, the legal system)，並且認爲一旦體系規範與目標國之間存在文化匹配時，規範擴散將更快速。此外，鄒讜 (Tang Tsou) 教授在研究中共改革國家制度而重新界定黨與國家關係時，認爲在黨與其它所有社會機構之間的關係上，可以概括爲黨「自我限制」(self-limitation) 對後者的權力。就黨與國家的關係而言，1982 年 9 月通過黨章後緊接著頒布憲法的事實，表明一個額外的特徵——黨「約束自己」或「自己預先承諾」(precommits oneself) 要遵守某種行爲程序，避免違反程序的行爲。本文認爲前述的「約束自己」或「自己預先承諾」等兩項國內政治規範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規範具有明顯的「文化匹配」，因而比對中國在裁軍與軍備管制上的行爲表現上，可以發現具有很強的適用性。例如長期採用不首先用核武、不使用及威脅使用核子武器來對付非核武國家或非核地區；主動接受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戰略武器的限制，承諾奉行不主張、不鼓勵、不從事核武器擴散，不幫助別國發展核武器；參與國際多邊出口控制建制及限制自身核能技術出口等政策。在後文所探討的範疇中，可以明顯看出中國在爭取國家形象過程中，明顯交互運用這兩個規範。Jeffrey T. Checkel,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March 1999), p. 87；何高潮等譯，Tang Tsou 著，*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55。

註 ⑪ 有關「建制」的定義，目前以 Stephen D. Krasner 的說法較廣爲接受。他將建制定義爲：「某特定國際關係領域的一組含蓄的 (implicit) 或明確的 (explicit) 原則、規範、規則以及決策程序，行爲體的預期以之爲核心匯聚在一起。」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 p. 186.

## 貳、規範、身分認同、國家利益與行為

所謂「規範」(norm)，普遍的定義是「對某個給定認同所應該採取之適當行為的集體期望 (Norms are collective expectations about proper behavior for a given identity)。」<sup>⑫</sup>建構主義相當重視規範的形成與作用，往往將規範看成是國家認同與利益的基礎。Peter J. Katzenstein 認為規範作為一種社會事實，對政治的潛在影響之重要性如同物質權力和理性算計一樣。規範不僅能夠說明政治行為體如何界定他們所要達到的目標，亦有助於協調政治衝突 (規則性規範)，通過認同影響政治衝突 (構成性規範)。相反地，忽視規範的存在，把行為體的利益看成是既成、給定的，就會繞過國家安全政治和政策中一個重要方面，總之，規範對國家安全與政治影響甚大。<sup>⑬</sup>

「身分認同」(identity) 的功能則主要是聯結環境結構與國家利益，其源自社會心理學，指涉的是行為體所持有的和投射的個性和獨特 (自我) 的形象，並且透過與重要的「他者」的關係而形塑 (隨著時間的更改)。因此，身分認同 (通常) 指涉的是相互建構以及自我與他者的形象演化。<sup>⑭</sup>正如 Ted Hopf 所指出的：「為了確保最低程度的可預測性及秩序，身分認同在國際政治及國內社會都是必須的，沒有身分認同的世界是一個渾沌的世界。獨特的身分認同在社會中具有三個基本功能：它將告訴自己我們是誰、告訴他人我們是誰和告訴自己他人是誰。在告訴自己我們是誰的過程中，身分認同強烈地顯示了一套涉及特定領域行為抉擇與特定行為者的利益及偏好。」<sup>⑮</sup>而國家身分認同則是基於國際社會承認的國家形象與特徵的自我設定，它隨著國家間互動方式而變化。國家間互動在一定階段固定化成國際規範，國際規範反過來決定著各國的身分和利益，當國際規範發生變化時，這些國家的身分也會隨之變化，利益也將發生相應的轉變。<sup>⑯</sup>簡言之，一個國家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或是影響，與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身分定位」有相當的關聯性，而國家的身分是透過該國本身與其他成員在國際關係中不斷的互動所建構而成的，這種身分的認知一旦形成，又會反過來影響行為體之間的互動。

註⑫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4.

註⑬ 李小華譯，Peter J. Katzenstein 著，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與自衛隊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前言部分，頁 7~8。

註⑭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p. 59.

註⑮ Ted Hopf,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1 (Summer 1998), pp. 174~175.

註⑯ 孫溯源，「集體認同與國際政治：一種文化視角」，現代國際關係 (北京)，第 1 期 (2003 年)，頁 41。

在規範與身分認同對國家利益及國家行為的影響上，Alexander Wendt 否定結構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假定國家的身分和利益是給定的看法，相反地，他認為國家行為是由國家身分和利益決定的，所以，只有確認國家身分和利益之後，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釋國家的行為。<sup>①⑦</sup> Martha Finnemore 認為國際體系是由一系列規範所支配，從提供理性目標和制度化建設兩方面對國家進行塑造，不僅規範行為者的行為，也塑造它們的社會身分和實有存在。<sup>①⑧</sup> 國家則被鑲嵌（embedded）在跨國及國際社會關係的綿密網絡中，這種網絡形塑了它們對世界的認知與其本身在世界中的角色。國家利益是在國際化的規範和理解（understandings）什麼是好的與合適的情境脈絡（context）下所界定的。規範的情境脈絡影響了決策者與那些可能選擇或限制決策者的大眾之行為；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規範的情境脈絡也會改變，而當國際化的規範與價值改變時，就會引起整個體系內的國家利益和國家行為的相應改變。她強調國家利益的再界定，常常不是外部威脅和國內團體要求的結果，而是由國際共享的規範和價值所塑造，規範和價值建構國際政治生活並賦予其意義。<sup>①⑨</sup>

誠如 Jeffery T. Checkel 所強調的：物質結構只有在社會脈絡的詮釋下才能獲得意義。<sup>①⑩</sup> 國家利益不是先驗給定的，而是產生於社會互動和社會化的過程中。雖然國家加入社會化的動機中，國家利益的權衡當然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國家想要成為國際社會成員與共同體樂於接納成員國的相互需求，<sup>①⑪</sup> 亦即國家行為與國際體系是一種相互建構關係，國家經由彼此互動關係與過程，來影響和建構國際社會結構；相對地，國際社會的結構和規範機制，也會塑造國家的認知和利益。換言之，國家參與某項國際議題的活動或規範政策制定，將受其影響而改變國家的認知和利益。<sup>①⑫</sup> 但必須注意的是，在強調規範的重要性時，不可忽視以大國為主的強大行為者（powerful actors）之利益，在規範影響中的重要意義。因為國際規範通常反映的是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利益，大國通過強化制度性安排來促進其政治目標的實現。同時，基於正義和榮譽的原則而建立的規範本身具有合法性的功能，能夠加強體系中主導大國的地位。簡言之，大國利益與規範之間存在相互強化和相互擴展的聯繫，規範能夠賦予利益以道德上的正當性，促使行為體形成一定的共同理解（common understanding）。此外，決策者有時候很難區分規範與利益，被內化了的規範也許已經成為了利益的一部分，而

註①⑦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93-243.

註①⑧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68.

註①⑨ *Ibid.*, pp. 2-3.

註①⑩ Jeffery T. Checkel,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 326.

註①⑪ 秦亞青、魏玲，「結構、進程與權力的社會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3期（2007年），頁11。

註①⑫ 楊永明，「國際限武裁軍機制與規範：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規範之檢驗」，*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3期（2004年5、6月），頁89。

行為體所追求的利益很可能就是某種規範，維護規範其實就是維護利益。<sup>②</sup>總之，在因果關係上，顯示國家外交政策和行為的變化是由國家利益的變化所引發，國家利益的變化又是國家對自身身分認同下的結果，而在身分認同的轉變中，規範雖然不是絕對的，但卻是扮演著不可或缺，或者可說是催化的角色。

上述的概念運用在國際政治上，如果某個國家由於歷史經驗將自己的身分定位為一個國際體系外的大國，並且由於體系內主要國家和這個體系外大國，在相互的實踐活動中都將他者定義為敵人，那麼這個體系外大國的利益基點，是改變現有國際體系，而體系內的主要國家也會把排斥、遏制體系外大國作為自己的國家利益基點。反之，如果在進一步的互動中，體系外大國將自己的身分定位為應該參與體系，並願意成為體系內負責任的國家，而系統內主要國家通過在實踐中的認知，認為這個體系外大國不但正在努力參與體系，也應該並能夠成為體系內負責任的國家，那麼，原來的安全困境就可以解構，雙方就可以重新定義基於這種新的認知的國家利益。這就為政策協調和國家間合作開拓了路徑。<sup>③</sup>

在相關實證研究成果上，Finnemore 研究國家利益是怎樣產生時，發現：國際組織教導國家應該具有什麼身分，進而國家根據被教導的身分定義自己的利益，其表現方式即「國際規範→國際組織教導→規範接受」。<sup>④</sup> Amitav Acharya 對東協國家的研究，修正和豐富了國際關係研究中的規範擴散理論，其研究發現：越符合地區規範結構的全球性規範就越容易被地區接受；反之，越不符合地區規範結構的全球性規範就越不容易被地區所接受。<sup>⑤</sup> Thomas Berger 則認為，今天的德國和日本與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存在根本的不同，反軍事主義已經成為德、日作為國家自我意識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並內化在國內規範和制度中。<sup>⑥</sup> Katzanstein 透過對戰後日本和德國的警察和軍隊作了相似的分析，得出同樣的結論，驗證了規範形塑並且影響著國家的認同與利益，規範的變化意味著國家利益的變動，國家利益處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它是通過與國際社會的相互作用而建構的。<sup>⑦</sup> Robert G. Herman 則以身分轉變帶來利益變化的理論，

註 ② 正是在此意義上，規範才能夠起到強化行為體的身分認同和建構新利益的作用，因為抽象的道德原則或純粹的大國利益並不能形成主體間的共同理解，也不能產生群體內的認同，行為體的利己特徵會排斥一切可能的妥協與讓步。參見余建軍，「身分、規範與利益：理解中國國際制度行為轉變的理念途徑」，*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3 期（2009 年），頁 11；Ward Thomas, "Norms and Security: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Assassin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121.

註 ③ 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第 3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53。

註 ④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pp. 34-127.

註 ⑤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s?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Spring 2004), pp. 239-275.

註 ⑥ Thomas Berger,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Peter J. Katza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 317-345.

註 ⑦ 李小華譯，前引書，頁 38-236。



解釋了戈巴契夫改革及其在國際上產生的影響。<sup>②</sup>此外，近期比較受到矚目的研究成果，是 Alastair Iain Johnston 針對中國於 1980 年至 2000 年間在國際組織中（如聯合國裁軍會議、東協地區論壇、全面禁止核試驗談判等）歷經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的具體表現。他認為在透過「模仿」（mimicking）、「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及「說服」（persuasion）的社會化過程後，國際規範顯然已改變了中國的行為。<sup>③</sup>

目前中國對建構主義相關研究的質量日益增加，其中以秦亞青教授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他的看法與上述學者大致相同，認為國家身分是指一個國家相對於國際社會的角色。具體而言，國家身分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與主導國際社會的認同程度。<sup>④</sup>國家對國際社會的態度和行為是基於國家身分，不同身分的國家會有不同的觀念和因之產生的政策；同一個國家，如果其身分發生了具有意義的變化，則其對國際社會的觀念和政策也會因而產生變化。然而，國家的身分雖然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因素，但卻不是靜止不變的常數。環境的變化、社會進程的發展、互動頻率的增減都會導致國家身分在一定程度上的變化。這些變化經過行為者在實踐互動中的回饋，就會使行為者原先的身分定位進行反思、修正或改變。<sup>⑤</sup>

秦亞青教授進一步將國家身分區分為：現狀性、游離性和革命性三類（如圖 1）。與主導國際社會具有正向認同的國家是「現狀性國家」；與國際社會具有零向認同的國家是「游離國家」；與國際社會具有負向認同的國家是「革命性國家」。「現狀性國家」希望維護國際社會的基本現狀；「游離國家」根據自己的好惡取捨；而「革命性國家」則希望改變國際社會的基本現狀。依照認同的程度，「現狀性國家」又在三個層次上與國際社會認同，或稱為三個等級的認同。第一等級是「強制性認同」，指國家受到強烈的外力脅迫，在自己不情願的情況下與國際社會認同。這往往發生在一個權力霸權體系之內，強烈的外力來自霸權國。第二等級的認同是「利益性認同」，指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與國際社會認同，自我利益的驅動使國家產生加入國際社會的動機，並希望維護國際社會的基本秩序安排。在制度霸權體系或制度化的國際社會中容易產生第二等級認同。第三等級認同是「觀念性認同」，指國家與國際社會的融合，涉及身分、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這是既無需外力強制，也不用利益驅動的認同，是對國際社會制度和規範內化的結果，<sup>⑥</sup>亦可視為是大國擔負國際責任的最高標準。

註 ② Robert G. Herman, "Identity,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 271-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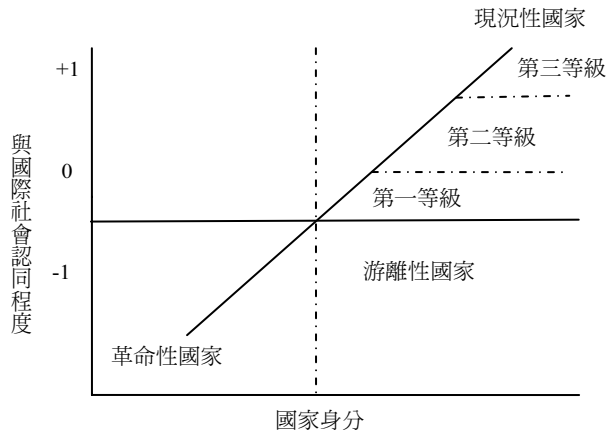
註 ③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註 ④ 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一種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10。

註 ⑤ 同前註，頁 10-11。

註 ⑥ 同註 ④。

圖 1 國際社會與國家身分



資料來源：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一種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頁 10。

基本上，上述三種分類與 Wendt 假設的國家遵守規範的三個等級（The Three Degree Hypotheses）大致相符：（1）第一等級：行為體知道規範是什麼，但是只在受到強迫，或某種威脅、懲罰時才會服從規範。亦即遵守規範是被強制或被迫的，其行為純粹是受到外力驅使，因而其服從的質量很低，需要不斷的壓力才能持續，一旦取消強制力，則其必會打破規範；（2）第二等級：行為體服從規範不是因為規範具有合法性，而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符合自我的利益（self-interest），因此對規範的服從是工具性的。與脅迫相比，其服從較多地是由內在動力驅使的，或自我調節的（self-regulating），會嘗試承擔與角色期望相吻合的身分，因而可能有較高的質量，即使沒有脅迫，行為體也會傾向服從；（3）第三等級：遵守規範是因為認為規範具有合法性，而不是外生給定的。行為體完全接受規範對自己的要求，行為體與他人的期望及認同一致，把自我視為他者的一部分。如此一來，他者就在自我的認知界限之內，也建構了自我相對於他者的身分。<sup>⑭</sup>

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看，中國對待國際體系（制度）的態度和行為歷經了從否定、排斥、反對到接受、參與、融入的巨大變化。促使發生這種轉變的機制與動因，除了物質利益考慮和工具性目的外，身分、規範等觀念性因素在其中起著更為基礎性和趨動性的作用。中國在不同時期的身分狀況，決定了它對國際規範的認知和利益需求的結構，由此影響了它對國際體系（制度）的選擇與行為方式。<sup>⑮</sup>在 1970 年代以前，中國自我身分定位是一個具有比較明顯革命性的體制外國家，作為一個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此階段中國理解的國際責任無疑就是維護馬列主義真理純潔性，推動世界革命，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運動，聯合各國的無產階級徹底推翻當時的國際秩序，建

註 ⑭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68~273.

註 ⑮ 余建軍，前引文，頁 11。

立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新世界；1980 年代以前則具有一定的游離性，此階段，中國已開始淡化國際體系革命者和挑戰者的身分特徵，但卻開始強化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反對者和第三世界代言人的角色，因而此時中國眼中的國際責任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力爭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1980 年代以後則是現狀性國家，中國將自己定位為「和平發展者」，在以經濟發展利益為核心，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政策之時，中國的國際責任亦隨之改變，此階段中國的國際責任則側重認同和完善現有國際體系。<sup>③⑥</sup>

同時，在經過對國際體系的不斷的參與、觀察及學習後，中國持續深化對現有國際體系的認同程度，其承擔國際責任的意識與能力也相應增加，在國際上的身分定位日益明確。時至 2006 年 4 月 3 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針對中國綜合國力增強，將對國際社會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問題，明確表示中國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正以實際行動在世界上發揮著負責任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嚴格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堅定地維護世界和平，是國際體系的參與者、擁護者和建設者；積極參與反恐和防擴散合作；推進國際裁軍和軍控事業等方面。」<sup>③⑦</sup>由此觀之，在負責任大國的身分下，中國對國際體系的認同感與國家利益內涵的認識正逐漸擴展，因而中國在尋求經濟及物質利益的同時，也積極尋求優質的國際形象、影響力與號召力等軟實力的建構，而其外交實踐也相應地表現出更多的「利他性」行為。

## 參、中國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的身分轉變過程

裁軍（Disarmament）與軍備管制（Arms Control）都是為了解決和平與安全問題所衍生出來的手段。Hedley Bull 認為「裁軍」是減少或廢除軍事裝備，它可能是單邊的或多邊的，總體的或地方的，全面的或部分的，有控制的或沒控制的。總體的和全面的裁軍是最廣泛的裁軍目標，指的是世界範圍內的所有主要類別武器的削減。「軍備

註 ③⑥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99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頁 152；謝益顯，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40；王超，「當代中國身分定位的演變對其參與國際合作的影響」，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編，國際關係研究：合作理論及爭鳴—2008 年博士論壇（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頁 199-211；秦亞青，前引文，頁 11；李寶俊、徐正源，前引文，頁 52。

註 ③⑦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領導人雖然公開表態是國際體系的參與者、擁護者和建設者，但並不表示其完全贊同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其外交宣示仍維持濃厚的道義色彩。例如中共十七大報告中仍強調中國的外交任務是「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參見溫家寶，「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人民日報（北京），2006 年 4 月 4 日，第 3 版；「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07 年 10 月 25 日，<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管制」則是國際範圍內軍備政策的克制，包含軍備水平、性能、部署或是運用等。<sup>③</sup>中國對於裁軍與軍備管制的看法與 Bull 的定義類似；潘振強認為「裁軍」既指削減軍事力量（人員裝備）的數量，也應指停止武器裝備質量上的改進。如果只有前者而無後者，則削減數量只能是變相的武器更新，沒有實際意義。一般說來，通過談判達成合理的削減，是真正意義上的裁軍，是減少戰爭威脅的最有效手段。特別是在核子武器領域，只有逐步削減核武庫（質量和數量），才能最終導致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子武器；此外，禁止某一類武器，也應看作是裁軍的範疇，是裁軍的最高形式。「軍備管制」則是指對軍事力量做出某種限制，但多數情況下並不阻止其發展，也並不意味著對軍事力量進行削減。軍備管制的意義在於對各國的軍備發展制定一個規則，使得軍備發展或者軍備競賽不致失控。<sup>④</sup>從以上的定義可以得知，裁軍和軍備管制的區別關鍵在於前者強調削減，後者則是強調克制。

在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的規範管制體系結構上，國內學者袁易曾以國際防止擴散為例，將國際防擴散管制的制度安排分為：全球條約、技術管制建制及國內出口管制三個層級。第一層級是在《核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NPT）中規定各個成員國的義務；第二層級則限於有能力供應核材料和技術的國家（即供應國聯合體）。這些國家被要求採取集體的作為，以監視和限制生產製造核武器所需之知識、專門技術和裂變材料之擴散；第三層級則是個別國家之出口管制法。上述三層結構管制體系正分別建構起管制建制，形成相互共同的層級性管制結構。<sup>⑤</sup>楊永明教授則認為國際社會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禁止與防止擴散，基本上有三個層級結構的整體管制體系：國際條約、國際組織與建制、以及國家管制。國際條約代表著高層國際法規範性建構，國際組織與建制代表著執行國際法規範的國際多邊組織與管制，而國家管制則是以國內法體系補充並強化國際管制的不足。通常國際條約是屬於規範性層面，強調限武（軍備管制）與裁軍議題的基本原則與法律規範；國際組織與建制則是較為嚴格的執行與監督機構，透過查核制度與程序，限制國家行為的功能更為明顯；至於國家管制則可能是最嚴密或是最鬆散的管制措施，端視國家國內法規與政策，以及該國國內管制措施對於其他國家或團體制裁的程度與成效而定。<sup>⑥</sup>

註③ Hedley Bull,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Missile Ag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1), p. vii.另依據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的定義，「裁軍」係將軍事機構裁減至國際協定所規定之標準；「軍備管制」則係任何涉及下列事項之構想：（1）依據明確或含蓄之國際協定所做的有關於管制：任何一方之任何計畫、安排或處理；武器系統的數量、類型及性能（包括指揮與管制、後勤支援方式及任何有關情報蒐集方法）；兵力數字、編組、裝備、三軍之部署與運用（包括裁軍）；（2）某些情況下，為減低軍事環境中不穩定情勢所採取的措施。參見三軍大學譯，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著，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 年），頁 65、209。

註④ 潘振強，*國際裁軍與軍備控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7。

註⑤ 袁易，「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分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275~276。

註⑥ 楊永明，前引文，頁 81。

兩位學者指涉的範圍略有不同，前者強調全球條約並將技術管制建制單獨劃分為一個層級，後者則將全球性及區域性條約含括在國際條約範疇，並且將國內管制劃歸在國家管制層級內，其中包含美、蘇（俄）間簽訂的雙邊條約。但在軍備的分類上，兩者則一致劃分為核子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彈道導彈及傳統武器等五大項。本文結合二位學者的看法，並參考中國官方分類，<sup>④</sup>認為除了上述五項之外，有關「防止外空武器化及外空軍備競賽等」，應單獨劃歸為「其他」類。（當前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的制度安排，如表 1）

表 1 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的制度安排

軍備種類 結構層級	核子武器	化學武器	生物武器	彈道導彈	傳統武器	其他
第一層級						
國際條約	核不擴散條約 全面禁止核子 試驗條約 區域性非核區 條約	日內瓦議定書 禁止化學武器 公約	日內瓦議定書 禁止生物武器 公約	—	禁止人員殺傷 地雷條約 開放天空條約 歐洲傳統武器 條約	南極條約 外層空間條約
查核機構	國際原子能總 署、詹格委員 會、全面禁止 核試驗條約組 織	禁止化學武器 組織（準備委 員會）	禁止生物武器 公約之專家組 會議和年會	—	聯合國傳統武 器登記制	—
第二層級						
供應國聯合體	核供應集團	澳洲集團	澳洲集團	導彈技術管制 建制	瓦塞納協定	—
第三層級						
國家管制	國內管制 美蘇SALT I, II 美俄START I, II	國內管制	國內管制	美蘇ABM條 約 美國飛彈制裁 法案	國內管制	國內管制

說明：1.目前「生物武器核查議定書」談判失敗，在重啟談判幾乎沒有可能的情況下，締約國加強《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有效性的努力，主要體現在專家組會議和年會進程上；2.國際條約含括全球、區域及雙邊條約；3.「其他」主要係指防止外空武器化及外空軍備競賽；4.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要僅負責《核不擴散條約》的查核。

資料來源：袁易，「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分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頁 281；楊永明，「國際限武裁軍機制與規範：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規範之檢驗」，頁 81~83；安儲，「2004 年國際生物、化學武器控制與裁軍綜述」，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主編，2005 年度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報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109~113；「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前引文。

註④ 潘振強在《國際裁軍與軍備控制》乙書將軍備管制種類區分為「核裁軍、禁核試驗、外空軍備控制、常規裁軍、化武裁軍及防擴散」等領域；「2005 年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則區分為「核子、化學、生物、常規與其他」等領域。參見潘振強，前引書，頁 429~435；「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中國網，2005 年 9 月 1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sy/957526.htm>。

在中國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上，顯然是一個逐步學習認識和調適的身分轉變過程。事實上，中國剛開始加入時，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國際政治壓力下的不情願反應（a reluctant response），但後來證明因加入多邊的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反而能獲得安全利益，這使得中國逐漸改變以往的態度。<sup>④③</sup>換言之，在安全概念上，是一個從強調自助（Self-Help）到安全的相互依賴（Security Interdependence）轉變過程，<sup>④④</sup>此過程的具體行為表現，就顯示出從「基本抵制」→「部分參與」→再到「全面參與」的特徵；同時，中國的國家身分認同也呈現相對應的演變。

### 一、革命性國家－基本抵制

季辛吉認為一個強權只要認為現存的國際秩序或其合法性是不公正的，則與其他的強權的關係必然是革命性的。<sup>④⑤</sup>中國在 1950 年代雖然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敵視，但此時中國還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性國家，其外交政策仍是防禦性的，主要目標是弱化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地位，防止亞洲國家參與美國對中國的外交孤立、經濟制裁與軍事包圍，中國在此階段的確不承認國際現狀，但卻沒有對國際現狀直接挑戰，這種情形直到 1960 年代早期以後才有所轉變，真正成為革命性的國家。<sup>④⑥</sup>在整個 1950 年代期間，中國僅加入了 1952 年《日內瓦議定書》（Geneva Protocol），此條約限制國家間衝突時使用毒氣，當初中國加入的原因，主要是為了政權的合法性以及日軍在二次大戰期間曾在中國大陸使用毒氣。<sup>④⑦</sup>

「革命性國家」的身分認同，界定了中國的利益所在，表現在行為上的必然是對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的抵制，尤其是任何會限制中國相對能力的軍備管制協定，均持反對立場，較特殊的是，中國也反對美、蘇之間的雙邊軍備管制，將其視為是「霸權制度化」的表現。<sup>④⑧</sup>在此認知下，中國反對美、蘇於 1963 年提出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Limited Test Ban Treaty, LTBT），認為該條約是「一個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騙局」，因為「這個條約企圖鞏固三個核子大國的壟斷地位，而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

註 ④③ 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East Asian Security*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p. 227.

註 ④④ *Ibid.*, pp. 230-233.

註 ④⑤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 Crosse and Durrilap, 1964), p. 2.

註 ④⑥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84), p. 184.

註 ④⑦ Gerald Chan, *China's Compliance in Global Affairs: Trade, Arms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M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6), p. 114.

註 ④⑧ 中國在 1970 年代，相信美、蘇之間的雙邊軍備管制會對其造成安全威脅，這主要是因為中國認為蘇聯的社會帝國主義是具有攻擊性的，任何超級強權間的協議都會讓蘇聯獲利，弱化西方國家的決心，而也會斷傷中國的反蘇統一戰線。Alastair Iain Johnsto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a Journal*, No. 35 (January 1996), p. 34.

的手腳束縛起來。」<sup>④</sup>但出人意料的是，1964 年 10 月 6 日中國成功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後，即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sup>⑤</sup>首次顯示出前述的「約束自己」或「自己預先承諾」之特殊形象塑造方式。此後，中國亦反對 1968 年開放簽署，1970 年生效的《核不擴散條約》(NPT)，雖然該條約承認中國是「五大核武俱樂部」成員之一，從現實主義的角度看，是有利於中國的安全利益的，但中國並未加入此條約。<sup>⑥</sup>然而，對革命性國家身分的認定，也並非導致對建制的完全抵制。此期間中國對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也有一些低層次的參與。例如中國於 1973 年 8 月簽署《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條約》第 2 號附加協定書 (Additional Protocol II to the Treaty for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Treaty of Tlatelolco)，保證不對拉丁美洲無核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也不在這些國家和這一地區試驗、製造、生產、儲存、安裝或部署核武器，或使自己帶有核武器的運載工具通過拉丁美洲國家的領土、領海和領空。<sup>⑦</sup>這是中國對國際核不擴散機制的最早參與，也再次顯示出前述的特殊形象塑造方式。就當時的時空環境而言，此條約的簽訂應與其三個世界理論的實踐有關，但實際上此條約也不會對中國的能力造成實質的限制。

## 二、游離性國家－部分參與

1978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中國開始放棄了「局外者」與「挑戰者」的身分，成為多數國際組織與建制的參與者，但由於歷史因素和現實環境的制約，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步伐還有些搖擺。中國在此時期的戰略是以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為核心，充分體現出經濟利益導向的特徵，<sup>⑧</sup>而對各種多邊安全組織和建制，則採取謹慎觀望態度或有限參與政策，擔心一旦加入就要受到限制或被孤立；因此，除了缺乏制度性的規

註④ 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00-305。

註⑤ 夏立平，《亞太地區軍備控制與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592。

註⑥ 《核不擴散條約》(NPT) 將核武國家定義為那些在 1967 年以前試爆核武成功的國家，即美國（1945 年首次核試爆）、蘇聯（1949 年）、英國（1952 年）、法國（1960 年）及中國（1964 年）。該條約包含有核武國家及無核武國家兩種類型的簽約國，條約的核心是：（1）只允許 5 個公認的核武大國擁有核子武器，但承諾在將來不特定日期進行全面核裁軍；（2）無核國家承諾維持現狀，永久放棄擁有核子武器，不研發、製造和裝備核子武器；（3）簽字國除了允許國際原子能總署對特定設施的核查外，還允許對不特定設施檢查以及進行突擊檢查，而所有 5 個核武國家則許諾幫助推廣和平使用的核子技術。由於該條約的歧視性政策，使得有些國家仍拒絕簽約。有關《核不擴散條約》的發展、內容、面臨之挑戰與中國不加入的原因，參見 Richard Gray,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in Craig A. Snyder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Hampshire: Macmillan, 1999), pp. 171-193; Joseph F. Pilat and Robert E. Pendley, *Beyond 1995: The Future of the NPT Regime*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pp. 177-181; 周寶根，「中國與核不擴散機制的一種建構主義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3 年），頁 25；朱鋒，*彈道導彈防禦計畫與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239。

註⑦ 潘振強，前引書，頁 415-416。

註⑧ 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於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4 期（2005 年），頁 20。

定、較為鬆散的論壇之外，中國從來沒有作為主要發起國參與建立任何多邊組織或建制。<sup>⑤4</sup>然而，此時中國已開始進入大規模社會學習階段，即潛在的加入者將國際社會的規範與價值觀念內在化的過程（a process in which a potential entrant to a society internalizes the norms and values of that society）。<sup>⑤5</sup>

同時，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活動也產生了積極的溢出效應，不僅引進了新的觀念（規範），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決策模式，還促進了中國對其他國際建制的參與，即使是最敏感的政治領域，中國的參與也是引人注目的。反映在裁軍與軍備管制議題上的行為表現，則是經歷了從初始認為裁軍與軍備管制是與中國無關的東、西方鬥爭的附屬品，到中國應該直接參與的轉變過程，並且體認到需要培養相關技術與安全議題上的專家。<sup>⑤6</sup>此轉變的標誌是 1980 年中國首次派代表團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CD）。參加此會議要求一定水準的技能與經驗，反過來要求中國對專家進行培訓，因而形成了一個激勵的動態過程。後來，由於參加裁軍與相關活動的需要，更衍生出一群在外交部的軍備管制專家、對此活動有興趣的科學家群體和在兩大群體與解放軍之間一種正式的政策協調程序的出現。<sup>⑤7</sup>基本上，中國參加裁軍會議可能與鄧小平重新評估列寧及毛澤東的戰爭不可避免理論相對應，但明顯地，這種修正本身與需要為國內經濟發展建立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有關。<sup>⑤8</sup>然而，儘管此階段中國參與國際組織與建制的數量有了顯著的增加，但總體而言，中國的行為仍是被動的，很少提出建設性的解決辦法，更多的是發表原則性聲明。中國並不是議程的制定者，缺乏參與及議程創設意識。<sup>⑤9</sup>

此階段中國除了加入了代價較低的條約，如《南極條約》（Antarctic Treaty）、《南太平洋無核區條約》（Treaty of Rarotonga）和外空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COPUOS）擬定的《外層空間條約》（Outer Space Treaty）、《營救協定》（Rescue Agreement）、《責任公約》（Liability Convention）及《登記公約》

註⑤4 刑悅、詹奕嘉，「新身分·新利益·新外交－對中國新外交的建構主義分析」，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11 期（2006 年），頁 19。

註⑤5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4.

註⑤6 Banning N. Garrett and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p. 229.

註⑤7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240-242.

註⑤8 *Ibid.*, p. 240.

註⑤9 門洪華，前引文，頁 20-21。



(Registration Convention) 外，<sup>⑩</sup>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國對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的認知開始發生變化，中國開始加入一些需要做出犧牲或抑制其軍事抉擇的條約。1984 年 11 月加入了《禁止發展、生產、儲存細菌（生物）、毒素武器與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簡稱《禁止生物武器公約》，Biological and Toxin Weapons Convention, BTWC）外，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自 1988 年起，一直按照公約審議會議的決定，每年向聯合國提交《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建立信任措施宣布資料，並積極參與其議定書的談判以及締約國年會和專家組會議，<sup>⑪</sup>但中國在此規範的現場視察執行方式上，不僅反對隨機現場視察，亦反對澄清視察。<sup>⑫</sup>此外，在防止核擴散方面，中國在 1980 年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後，仍然支持發展中國家獲取核子能力（nuclear capacity）的權力，<sup>⑬</sup>時至 1984 年 3 月前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始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宣示：「中國對歧視性的《核不擴散條約》持批評態度，不參加這個條約，但是並不主張核擴散，也不搞核擴散，不幫助別的國家發展核武器。」<sup>⑭</sup>這表明中國在核不擴散問題上的立場已開始發生變化，不主張核擴散，也不搞核擴散，不幫助別的國家發展核武器，這反映的是「游離性國家」身分。此後，中國在 1986 年更自行宣布不再在大氣層進行核子試驗，這事實上承擔了 1963 年的《部分禁止核子試驗條約》（LTBT）對核子試驗的約束。這一點如果沒有中國在核不擴散問題上身分認同的轉變是難以發生的。<sup>⑮</sup>

註 ⑩ 1980 年 6 月，中國派出觀察員代表團參加了「外空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eaceful Uses of Outer Space, COPUOS）第 23 屆會議。1980 年 11 月 3 日，聯合國正式接納中國為該委員會成員國。此後，中國參加了歷屆外空委員會及其下屬的科技和法律小組委員會，並且派代表團出席了聯合國第二次和第三次外空大會。另外，中國於 1983 年 12 月加入了《關於各國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體在內外層空間活動的原則條約》（簡稱《外層空間條約》）；1988 年 12 月加入了《關於營救宇航員，送回宇航員及送回射入外空之物體之協定》（簡稱《營救協定》）、《外空物體所造成損害之國際責任公約》（簡稱《責任公約》）和《關於登記射入外層空間物體的公約》（簡稱《登記公約》）。「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COPUOS）」，人民網，2005 年 5 月 28 日，<http://world.people.com.cn/BIG5/8212/60991/61272/4273683.html>。

註 ⑪ 「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前引文。

註 ⑫ 值得注意的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約》除了聯合國安理會可採取的手段之外，並未建立任何違約行為的制裁建制，遭到違約懷疑的國家除了會遭到「澳洲集團」的出口管制所監控並且可能造成負面的聲譽外，就條約本身而言，並不會導致其它後果。參見陳怡凱、陳思齊譯，Marie I. Chevrier 著，「強化國際軍備管制機制」，Raymond A. Zilinskas 主編，生物戰的攻擊與防禦（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頁 201、206 及附註 53。

註 ⑬ Ann Kent,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 No. 3 (July/September 2002), p. 350.

註 ⑭ 趙紫陽，「在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新華網，2004 年 10 月 19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914.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914.htm)。

註 ⑮ 周寶根，前引文，頁 26

### 三、現狀性國家－全面參與

冷戰結束後，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的重點，由過去爭取軍事優勢和防止核子戰爭，轉向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的擴散，包括加強核不擴散與導彈技術管制建制（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防止生、化武器的擴散、以及強調軍事貿易的透明度，同時也開始對高科技常規武器的出口進行控制。<sup>⑥</sup>此時期，中國也越來越融入國際制度，對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的態度也變得更加合作。如前所述，身分的改變會導致利益的重新界定，從而出現政策的調整。時至 1992 年，中國終於將自己的「游離性國家」身分轉變到「現況性國家」身分，開始全面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其明顯的標誌是 1992 年 3 月正式加入作為國際核不擴散建制法律基礎的《核不擴散條約》（NPT）。<sup>⑦</sup>尤有進者，中國於 1996 年 10 月簽署《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Comprehensive Test Ban Treaty, CTBT），此條約是迄今中國加入的條約中最具潛在約束力的，被認為幾乎沒有實際的利益回報，但卻可能對中國造成一定的軍事實力削弱，各方普遍認為此舉表明了中國願意付出代價，爭取負責任大國的地位，促進自己的國際形象。<sup>⑧</sup>此外，據統計，1970 年代中國

註⑥ 潘振強，前引書，頁 422：學者認為某些潛在的擴散者經常在其進行發展核武的同時，也推動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發展計畫。生、化武器為這些國家帶來了幾項比核武更有利的優點：（1）生、化武器可提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能力的廉價之路；（2）幾乎所有用來生產生、化武器的科技與原料在性質上通常有雙重用途，而且因其商業用途而到處可尋。例如可將生產肥料的作業改為生產化學武器，而將製藥的生產技術轉化為生產生物戰劑；（3）生、化武器計畫更容易蒙蔽國際檢查人員的耳目，而且更不易受到空中打擊；（4）隨著科技的發展，導彈（特別是彈道導彈）已成為一種廉價而又具高度效力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投射系統。參見馬振宇譯，Robert G. Joseph 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回顧」，William H. Lewis and Stuart E. Johnson 主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反擴散的新展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7~8。

註⑦ 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接受超出《核不擴散條約》（NPT）的更多責任，包括不與不接受全面核安全保障的國家從事民用核能合作。這種限制自身核能技術出口的行爲，固然有助於中國從西方獲得民用核能合作（中國是有一定核技術出口能力的國家，西方要求中國限制自己向「有問題」的國家核出口行爲，來換取他們向中國出口中國所需更先進核技術的權利），但未必能促進自己在獲取外國石油燃料方面的利益。例如 2005 年，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競標收購美國的尤尼科石油公司時，也未因中國先前曾給予的防擴散合作而獲得回報：相反地，在美國府會的強烈干預下，此一收購被迫流產。沈丁立，「核擴散與國際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8 年），頁 11。

註⑧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訪談了中國核武器專家和軍事官員，他們對中國為什麼簽約的共同回答是：《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CTBT）得到大多數國家的贊同，並且認為它是《核不擴散條約》的支柱，因此中國別無選擇。此外，簽字即表明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參加這個條約是「全球氛圍」的一部分，如果反對或阻撓這個條約，則將會受到孤立。學內學者袁易亦認為此舉明顯地欠缺合理的物質利益或相對權力極大化的解釋，中國的加入並非基於明顯的附加利益或任何經濟或軍事上制裁的威脅下的作為，反而這項承諾很明顯地會對中國的軍事能力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其主因在於此舉符合世界潮流，並有助於中國形象的提升。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and Arms Control Institu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 108；袁易，*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五南圖書，2004 年），頁 131。

簽署的各項裁軍與軍備管制條約僅占協定總數 10%至 20%，時至 1996 年，此比例卻上升到了 85%至 90%，<sup>⑩</sup>有學者甚至以快速、史無前例的說法，形容中國在 1989 年至 1999 年間的表現。<sup>⑪</sup>此階段中國對於國際核不擴散體制的看法是：一個強有力的國際核不擴散體制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任何國家如果為了謀求政治、經濟或戰略上的短期利益，而無視核武器擴散的嚴重後果，甚至作出損害別國和國際團結的事情，最終本國的利益也必將受到損害。<sup>⑫</sup>由此可知，對「現狀性國家」身分的認同，導致中國認為防止核武器擴散符合中國利益的這一新的利益界定，從而在核不擴散政策的取向上，大致上與其他一般核國家保持一致。

在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橫向擴散問題上（即制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向更多國家擴散）。目前，在五大核國家中，除了中國外，其他四個國家仍然堅持必要時要首先使用核武器；另外，中國也持續不斷地強調其主動接受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戰略武器的限制，承諾奉行不主張、不鼓勵、不從事核武器擴散，不幫助別國發展核武器的政策。<sup>⑬</sup>1993 年 1 月，中國簽署《關於禁止發展、生產、儲存和使用化學武器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簡稱《禁止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CWC）。1993 年 7 月中國正式承諾，在自願的基礎上向國際原子能機構通報所有核材料、核設備及相關非核材料的進出口情況。1994 年 10 月，中、美兩國外長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願意共同努力，推動儘早達成一項多邊、非歧視性和可有效核查的《禁止生產核武器用裂變材料公約》（簡稱《禁產公約》）（Fissile Material Cut-off Treaty, FMCT）。1996 年 12 月 3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批准《禁止化學武器公約》，1997 年 4 月 25 日，中國交存了批准書，成為原始締約國。根據中國公布之數據，截至 2009 年 6 月，中國已順利接受禁止化武組織 190 餘次視察。<sup>⑭</sup>同時，在參與國際防核擴散的具體作為上，最明顯的是 1990 年代中期，中國開始調整政策並在緩解北韓核武危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期被視為是一個保持朝鮮半島和平、尋求解決和維護核不擴散條約的負責任參與者。<sup>⑮</sup>

在制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縱向擴散上（即參與國際多邊出口控制建制），中國同樣表現出對「現狀國家」身分的認同。例如支持 2004 年 4 月通過的《聯合國安理會

註⑩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and Arms Control Institutions," p. 101.

註⑪ Wendy Frieman,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

註⑫ 中國聯合國協會編，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有關會議發言匯編（1999 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頁 281。

註⑬ 潘振強，「試論國際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中國的對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8 期（2006 年），頁 11、434。

註⑭ 「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日期 2010 年 2 月 2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tytj/zcwj/t119270.htm>。

註⑮ 中國在北韓核武危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 2003 年成立的「六方會談」（six party talks）上，儘管離徹底解決問題還相當遙遠，但此建制卻能遏止北韓核武問題的進一步惡化。王軍、林民旺譯，Avery Goldstein 著，*中國大戰略與國際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頁 137~138；龐中英，*中國與亞洲：觀察·研究·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 年），頁 91。

1540 號決議》，<sup>⑤</sup>同時，中國也重視現有多國出口管制建制在防擴散領域發揮的重要作用，積極與這些建制開展對話與交流，學習和借鑒其經驗和作法。例如 1998 年 10 月加入「詹格委員會」(Zangger Committee, ZC)，2004 年 5 月申請加入「核供應集團」(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2004 年 7 月申請加入防止可運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導彈及其技術擴散的《導彈技術管制建制》(MTCR)。<sup>⑥</sup>中國還與「瓦塞納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 WA)<sup>⑦</sup>和「澳洲集團」(Australia Group, AG) 保持接觸和交流，迄今已分別舉行多輪的對話與磋商。<sup>⑧</sup>

在國內出口管制方面，中國採用了出口經營登記制度、許可證管理制度、最終用戶和最終用途證明制度與清單控制方法，建立了一套涵蓋核子、生物、化學、導彈及相關兩用物項和技術的出口管制法規體系，並根據承擔的國際義務和出口管制工作的需要，對有關法規進行更新。例如 2006 年 11 月，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出口管制條例》。2007 年 1 月，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核兩用品及相關技術出口管制條例》。同年 7 月，修訂《核兩用品及相關技術出口管制清單》。在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外空軍備競賽方面，2008 年 2 月，中國外交部宣稱與俄羅斯已共同向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對外空物體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條約》草案。<sup>⑨</sup>此外，鑒於常規武器，尤其是輕小武器的非法販運與濫用所造成的地區局勢不穩定和人道主義危機等問題日益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已依聯大決議要求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了政府立

註⑤ 2004 年 4 月，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第 1540 號決議，要求各國採取有效措施，加強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材料與技術的國內管理和出口管制，防範和打擊非國家實體獲取上述物項，並向安理會提交執行決議情況的國家報告。安理會根據該決議成立了由安理會全體成員組成的防擴散委員會（即 1540 委員會），審議各國提交的報告。「安理會第 1540 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320983.htm>。

註⑥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雖於 2004 年 7 月正式申請加入 MTCR，但因會員國未達成共識而暫時無法加入該建制。Anupam Srivastave, "China's Export Controls: Can Beijing's Actions Match Its Words," *Arms Control Today*, Vol. 35, No. 9 (November 2005), p. 20.

註⑦ 「瓦塞納協定」於 1996 年成立，目的是通過成員國間的資訊通報制度，加強對常規武器、雙用途物品及相關技術轉讓的監督和控制，現有 40 個參加國。2004 年 4 月、2005 年 5 月、2006 年 6 月，中國與該組織在維也納分別舉行了三輪對話會，就常規武器及兩用物項出口管制領域的相關問題交換意見。「瓦塞納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320981.htm>。

註⑧ 「核供應集團」創建於 1975 年，其宗旨是：通過對核子及核子相關材料、設備、軟體和技術的出口管制，防止核子武器擴散；「澳洲集團」成立於 1985 年，創立初期，成員國相互合作維護和完善其國家出口管制，以防止出口的化學品用於或轉用於化學武器計畫。現在成員國通過交換擴散案例資訊和處理這種案例的作法，防止有意或者無意地向化武計畫供應材料或設備。參見中國軍控與裁軍會議譯，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編，SIPRI 年鑒 2008：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頁 670-679；「中國與多國防擴散出口管制機制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2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410696.htm>。

註⑨ 「2008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軍控與裁軍」，中國新聞網，2009 年 1 月 19 日，<http://chinanews.sina.com/jczs/2009/0119/20213230874.html>。

場文件，願就談判《武器貿易條約》(Arms Trade Treaty, ATT) 可行性與各方保持溝通與交流，並參加了聯合國關於《武器貿易條約》問題政府專家組的相關工作。<sup>⑩</sup>

此外，近期在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議題上，較受矚目的是今年 4 月 6 日美國公布的第三份「核態勢評估報告」(Nuclear Posture Review, NPR)，及接續於 4 月 9 日簽署歷史性的美、俄《新裁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與 4 月 13 日召開的第一屆「核武高峰會」(Nuclear Security Summit)。三者的關係具有邏輯一貫性，可以將前者視為是基本藍圖，而後兩者則是具體實踐。對中國而言，標示美國新核武戰略的「核態勢評估報告」所呈現出的最大特點，應是不再以冷戰思維將中國及俄羅斯等核武強權視為立即性威脅。美國核武的主要用途不再是攻擊而是威懾，<sup>⑪</sup>此報告明顯展現出歐巴馬與小布希政府不同的核武政策與思維。<sup>⑫</sup>在實踐上，《新裁減戰略武器條約》有利於推動全球多邊核裁軍，不僅呼應了中國一貫主張的「核裁軍應遵循公正合理、逐步削減、向下平衡的原則，兩個擁有最大核武庫的國家對核裁軍負有特殊和優先的責任」等原則的正當性，<sup>⑬</sup>而且可以保持其現有的維持最低限度核武嚇阻戰略。「核武高峰會」則有利於防止核擴散與核恐怖主義，除符合國家利益之外，比對胡錦濤在「核武安全高峰會」提出的五點主張、四點承諾與《核安全高峰會公報全文》，可以發現兩者的主要觀點是吻合的，<sup>⑭</sup>此亦可凸顯出中國與世界核武規範的一致性。

註 ⑩ 「武器貿易條約倡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2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410717.htm>。

註 ⑪ 第三份「核態勢評估報告」提出的五點目標是：(1) 阻止核擴散與核恐怖主義；(2) 降低美國核武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角色；(3) 在減少核武的情況下仍保持戰略嚇阻與穩定；(4) 強化地區嚇阻與確保盟邦及夥伴的安全；(5) 維持一個安全有效的核武庫存。此報告強調美國將放棄發展新核武之外，雖然未明言放棄首先使用核武的立場，但亦宣布不會對已經簽署《核不擴散條約》(NPT) 的非核國家使用核武（北韓及伊朗除外）。“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ccess on March 30, 2010, <http://www.defense.gov/>.

註 ⑫ 小布希政府發布的「核態勢評估報告」，除強調不排除採取「先發制人」，並凸顯出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或威脅使用核武政策的改變。有關 2002 年美國「核態勢評估報告」之相關內容與中國的認知，參見丁樹範，「中美關於太空、導彈與核武政策爭議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13~117。

註 ⑬ 「核裁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 年 7 月 27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tytj/t119261.htm>。

註 ⑭ 胡錦濤提出的五點主張是：(1) 切實履行核安全的國家承諾和責任；(2) 切實鞏固現有核安全國際法框架；(3) 切實加強核安全國際合作；(4) 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核安全能力；(5) 切實處理好安全與和平利用核能的關係。在中國的作為方面，承諾：(1) 全面加強核安全能力；(2) 嚴格履行核安全國際義務；(3) 重視並積極參與國際核安全合作；(4) 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核安全援助。詳細內容，參見「胡錦濤在核安全峰會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0 年 4 月 14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679411.htm>；「核安峰會公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0 年 4 月 14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679505.htm>。

## 肆、中國參與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之綜合分析

### 一、身分認同轉變的規範與現實因素

根據新現實主義看法，國家生存在國際無政府體系中，必須依靠「自助」才能保衛主權及國家安全。<sup>⑤</sup>由於核武的強大毀滅力，任何國家面臨擁有核武的敵國時，唯有發展本身的嚇阻能力，才能對抗敵國對其國家安全所造成的威脅。正如 Avery Goldstein 所言，核武是「強固、負擔得起安全」(robust and affordable security) 的武器。<sup>⑥</sup>韓戰末期，以及 1950 年代的台海危機，美國的核武威脅致使中國決心發展核武，<sup>⑦</sup>而其反映在裁軍與軍備管制上的態度與作為，實際上就是一種傳統安全觀的展現。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美、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發展，致使中國對此議題的態度出現明顯變化，開始從競爭性轉向合作性的裁軍與軍備管制。此外，除了大國之間的合作與協調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外，中、小國家及非政府組織在此議題上的表現越來越活躍，反映出國際社會對冷戰後世界安全走向的關注，尤其在推動核裁軍以及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已成為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的兩大關注焦點。<sup>⑧</sup>

就規範的角度而言，學者認為從禁止使用核武及化武等禁止性規範 (prohibitory norms) 的存在，顯示了戰爭不是絕對的，相反地，戰爭展現了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特徵。國家領導人被迫尋求、發展在戰爭或防禦中可以使用的替代技術，否則就要冒著被劃出「文明」的國際社會之外的風險，因此，戰爭的限制和許可效應的根源，是「社會」而不是無政府狀態。<sup>⑨</sup>在規範的擴散方面，以核武為例，現今有關核武的規範 (如核不擴散條約)，如果沒有國際體系中強權的強力支持，是不可能產生的，這些強權初始支持規範的目的是為了替其狹隘的政治目的服務，但是一旦規範成功地被眾所接受，則規範就會形塑國家的身分認同與期望，甚至連創造這些規範的強權，也會逐漸被規範所限制。<sup>⑩</sup>這也說明了為何過去 1960 年代的核子試驗，被視為是可以得到聲

註 ⑤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註 ⑥ Avery Goldstein, "Robust and Affordable Security: Some Lessons From the Second-ranking Power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5, No. 4 (December 1992), p. 494.

註 ⑦ 有關 1950 年代美國核武威脅引發中國加緊核武計畫研究的詳細論述，參見 Di Hua, "Threat Perception and Military Planning in China: Domestic Instabi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stige," in Eric Arnett ed., *Military Capacity and the Risk of War: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Ir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8-31;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m, *China Builds the Bomb*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註 ⑧ 有關 1990 年代國際多邊軍備管制架構的鞏固與發展，參見朱鋒，前引書，頁 238-249。

註 ⑨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 145.

註 ⑩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97), p. 76.

譽且合法的行為，但現今卻成為不合法且不負責的行為？關鍵就是：「核不擴散條約」建制改變了規範。1960 年代「加入核子俱樂部」可以得到聲望與合法性，但在 1990 年代轉變成加入「遵守核不擴散條約俱樂部」的國家才被視為是正當的。<sup>⑩</sup>由此可知，順從適當的核武規範可以強化國家的認同和他們作為國際共同體的合法成員或者某種特定類型國家（負責任、文明的）的身分。<sup>⑪</sup>觀之上述中國的實際行為表現，顯然已受到規範的影響。

然而，中國在裁軍與軍備管制議題上，除前述的規範因素外，在相當程度上亦受到國際現實環境所制約。在核武議題上，反觀其他國家的作為，國際上幾個重要「核門檻」國家的態度也出現改變。1990 年巴西、阿根廷兩國開始將核設施置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管控制度之下。南非及法國於 1991 年宣布加入《核不擴散條約》（NPT），當時中國成為唯一沒有加入該條約的核武國家，因而國際壓力迫使中國必須重新思考加入該條約。<sup>⑫</sup>又如在《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CTBT）方面，當時美、俄、英、法等核武大國陸續停止核子試驗，因而中國面臨巨大的壓力；<sup>⑬</sup>再者，如表 2 所示，截至 1996 年止，美國核子試驗次數計 1,030 次，反觀中國僅 45 次；在數量上，英國、法國及中國加總的核武數目也僅占全世界核武的 3%，<sup>⑭</sup>此說明了中國與美、俄兩國差距過大，僅能擁有最基本核武嚇阻能力。此外，當時中國也可能是基於獲得第三世界國家的認同，<sup>⑮</sup>強化中國在五大核武國家中的信譽，以及希望與 1998 年 5 月印度核子試爆對比，以凸顯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等因素而簽訂條約。<sup>⑯</sup>

表 2 1945 至 1996 全世界已知的核武試驗

	美國	蘇聯	法國	英國	中國	印度
大氣層	215	219	50	21	23	0
地下	815	496	159	24	22	1
總計	1,030	715	209	45	45	1

資料來源：Raju G. C. Thomas, "The Renewed NPT: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p. 5.

註 ⑩ *Ibid.*

註 ⑪ Richard Price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Taboos," p. 142.

註 ⑫ 王君，「冷戰後中國不擴散政策的轉變及其原因分析」，*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4 期（2002 年），頁 61~71。

註 ⑬ Bates Gill,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Policy-making in an Era of Reform,"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9~264.

註 ⑭ Raju G. C. Thomas, "The Renewed NPT: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in Raju G. C. Thomas e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Prospects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5~6.

註 ⑮ 例如中國軍備管制專家潘振強明白指出：進一步推動全面、徹底的國際裁軍，已成為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而強烈的要求。我們也只有積極參與，才能更好團結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共同鬥爭。潘振強，前引書，頁 425。

註 ⑯ Wendy Frieman,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p. 57.

另外，在整體國際環境方面，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及 1991 年冷戰結束，使得中國必須透過國際制度找到與各國重大利益的契合點，以打破外交孤立。尤有進者，在國際上也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使得中國對國際制度的認知與反應產生了重大變化。<sup>⑧</sup>國際制度在中國大戰略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中國明確意識到只有通過負責任的國際行為，中國才能夠更好地回擊西方國家的懷疑和攻擊，才能加快與通行國際規則和慣例相適應的步伐，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的和平發展，而加入國際制度則是打破包圍、贏得負責任聲譽的重要條件。<sup>⑨</sup>中國必須向世界表明強大後將是國際社會中「遵紀守法」、「樂於行善」的好公民，因此，對外政策和行為越來越重視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中國加快融入國際社會的步伐，並且積極承擔國際責任，有學者甚至認為其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建立，已成為與經濟利益同等重要，甚至是更重要的國家利益。<sup>⑩</sup>

## 二、合作的質量

中國加入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的相關條約中，除了《核不擴散條約》及《全面禁止核子試驗條約》外，大多數是屬於最小限度的政策調整，表現出較低的合作質量。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雖已加入多數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但對於建制的認知與執行方式卻明顯有歧見，美國國防部甚至認為中國在 1990 年代扮演著核生化武器供應者的角色。如表 3 所示，中國在 1990 年代曾採取許多措施以強化對敏感物品的外銷管制，但基於考量在南亞及中東的整體戰略利益，以及內部經濟壓力的驅動下，中國所屬的一些公司卻仍對某些從事武器擴散的國家提供核武、化武及導彈計畫等方面的協助。<sup>⑪</sup>近年來，中國對禁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問題的態度雖已有所改善，放棄了與伊朗之間的所有核武合作關係；此外，也承諾不對任何欠缺安全防護的核武設施提供協助，但美國國防部不排除中國仍持續在此方面與其他國家有所接觸可能性。<sup>⑫</sup>

註 ⑧ 有關「中國威脅論」的說法，以 John J. Mearsheimer 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分析了國際體系的結構性規則後斷言，如果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肯定會運用經濟實力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出於合理的戰略原因，一定會像 19 世紀美國在西半球所做的那樣，尋求地區霸權。亦即富強的中國不會是一個維護現狀的大國，而會是個決心要獲取地區霸權的侵略性國家，而這不是因為富裕的中國就會有不良動機，而是因為對任何國家來說，使其生存展望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成為地區的霸權。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2001), pp. 401~402.

註 ⑨ 劉杰，「走向負責任大國：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定位及路徑選擇」，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負責任大國的路徑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 年），頁 22；門洪華，前引文，頁 21。

註 ⑩ 刑悅、詹奕嘉，前引文，頁 21。

註 ⑪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roliferation: Threat and Response*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p. 17.

註 ⑫ *Ibid.*, p. 18.



表 3 1990 年代中國的主要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活動

接受者	交易／合作形態	意涵
伊朗	化學原料之生產技術與設備。	有助於伊朗達成自給自足的化學武器發展計畫。
伊朗、北韓、利比亞、巴基斯坦	與導彈有關之組件、原料及技術協助。	強化接受國的導彈生產能力。
伊朗	小型的研究用核子反應爐、鋳生產設施；終止了鈾轉換設施的交易。	1.強化伊朗有關核燃料週期方面之知識。 2.緩和了有關核子擴散的憂慮。
巴基斯坦	曾協助巴基斯坦建立鈾生產反應爐。	協助巴基斯坦生產鈾元素。
巴基斯坦	提供巴基斯坦M-11導彈	強化巴基斯坦的導彈能力。

資料來源：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roliferation: Threat and Response*, p. 18.

目前比較有爭議的規範主要是《導彈技術管制建制》(MTCR)，這項建制是七大工業國於 1987 年共同創立，是一項減少核子擴散風險的新出口管制協定，藉由管控發射核子武器的無人投射系統的交易行為，來達到「限制風險」之目的。此後，建制的範圍擴大含括能配備核生化武器的無人投射系統。<sup>⑩</sup>中國在導彈不擴散 (missile nonproliferation) 政策與實踐的演化上，與其核不擴散行為有明顯的差異，主要表現在政策的轉變並非全面性的，而且速度較緩慢。在整個轉變過程中，美國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sup>⑪</sup>

中國在 1980 至 1990 年代，基本上並不認同國際反導彈擴散規範，甚至質疑 MTCR 的合法性，高度批判美國導彈不擴散政策的歧視性與雙重標準。<sup>⑫</sup>從中國的認知角度來看，國際間有關防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作為，重點應是以限制武器本身，而非限制運載武器的載具。<sup>⑬</sup>同時，中國認為此建制並不公平，因為該規範阻止出售已能控制的較簡單導彈科技，而卻容許美國、俄羅斯、法國及英國出口具有同樣能力投射彈藥的先進飛機，明顯是一種雙重標準的行為。此外，美國雖然期望中國遵守該建制的指導準則，但美國及其盟邦卻不讓中國參與起草該準則之作業，其原因是，這將會使中國接觸到導彈設計的敏感情報。<sup>⑭</sup>

的確，一開始美國未必真心想邀請中國加入 MTCR，美國的真正目的只是要藉由 MTCR 來進一步約束中國。美國也了解中國一旦正式成為 MTCR 成員，美國就必須和其分享許多與導彈有關的技術資訊，當時美國並沒有此等打算。美國一直對中國存有

註 ⑩ Dennis M. Gormley and Richard Speier, "New Missiles and Models for Cooperation," in Henry Sokolski ed., *Taming the Next Set of Strategic Weapons Threats*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6), p. 139.

註 ⑪ Evan S. Medeiro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97-98.

註 ⑫ *Ibid.*

註 ⑬ Cupitt and Murayma, "Export Contr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lletin of Asia-Pacific Studies*, No. 9 (1999), p. 25. 轉引自袁易，前引書，頁 157。

註 ⑭ Harry Harding,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Janne E. Nolan ed., *Global Engagement: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p. 425.

相當大的顧忌與保留，因為中國與俄國不同，美與前蘇聯已達成 MTCR 所欲限制類似級別導彈擴散的目標，美國不存在與俄國分享導彈參數的疑慮，因而俄國於 1995 年正式加入了 MTCR。然而，中國從未和美國簽署任何雙邊的軍備管制條約，美國認為中國要成為 MTCR 正式成員，就得要通過一個同化的過程，藉此證明中國已自我內化了國際規範後才符合被 MTCR 接受的要件。對美國而言，中國要內化 MTCR 規範的具體要件，在於先完備其國內的出口管制體系之建立，舉凡有關法律架構、發證體系、訓練、認證和全面性管制等要件缺一不可。為此，美國通過兩手並用策略，反覆展現在制裁和獎勵的交互運用。<sup>⑩</sup>

中、美雙方的僵局自 1997 年起開始有了轉機，在江澤民訪美並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後，雙方同意建立部長級別官員定期就包括軍備管制問題進行對話，中國開始承諾積極研究加入 MTCR 的可能性。<sup>⑪</sup>然而，中國雖接受 MTCR 的部分條款，但在條文的解讀與政策作法上，與該建制有難以解決的落差。<sup>⑫</sup>例如儘管中國在 1997 年頒布了《軍品出口管制條例》，但並未明確地將導彈和導彈相關技術轉讓含括在內；儘管中國有限制導彈出口的管制清單，然而並未公布其範圍、內容和與 MTCR「附錄」內容的相似程度。中國顯然企圖將加入 MTCR 與中、美兩國間其他更廣泛議題，如對台軍售、TMD 在東北亞的發展和未來部署等議題掛勾，不過事與願違，並遭到美國多次的經濟制裁。<sup>⑬</sup>

時至 2000 年 11 月 22 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首次正式聲明承諾，中國將不以任何方式協助其他國家發展運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導彈。中國將根據其防止導彈擴散基本立場和出口管制政策，進一步完善和加強相關的出口管制制度，並且將頒布包括導彈相關項目的全面出口管制清單之重要措施。在中、美有關 MTCR 的角力中，美國反覆使用獎勵與懲罰的兩手策略，而中國最後的「協議式遵循」MTCR 規範，顯示了中國會在重複囚徒困境狀態下進行合作，主要是受制於制度性監視和相關制裁條款制約的影響，<sup>⑭</sup>此亦顯示了中國在 MTCR 規範上所採取的態度，並非自發性的遵守，事實上仍存在濃厚的現實經濟與戰略安全利益的考量。

最後，在合作的質量上，另一個判準是目前還有那些條約尚未加入？現今中國尚未加入的條約，較引人注目的主要有兩項。一是 1995 年由東協各國簽訂的《東南亞無核區條約》(Southeast Asian Nuclear-Weapon-Free Zone Treaty, Treaty of Bangkok)。主

註⑩ 袁易，前引書，頁 313~314。

註⑪ 同前註，頁 198。

註⑫ Dennis M. Gormley and Richard Speier, "New Missiles and Models for Cooperation," p. 140.

註⑬ 袁易，前引書，頁 181~200。

註⑭ 針對中國違反 MTCR 規範議題，美國自 1987 年至 2003 年分別對中國實施七次經濟制裁。袁易教授進一步認為，從某種意義而言，中國在多邊性國際導彈建制的參與及實踐過程中，其原則性扞格國際規範的作為仍主導了中國的基本思路，並且凸顯出中國涉入國際建制越久、瞭解國際政治越深、其因應手法就越高明的這麼一個弔詭現象。袁易，前引書，頁 190~201；袁易，「中國與導彈建制：國際規範之挑戰與遵循」，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2004 年 5、6 月），頁 127。

要的爭議是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而這些地區目前仍存在領海主權糾紛。中國認為無核武器區的範圍不應包括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也不應包括與區域外國家存在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爭議的地區。<sup>⑩</sup>該條約規定，允許東協成員國以和平目的開發核能，但禁止開發和擁有核武器，另外，要求核武器擁有國運載核物資的船隻或飛機進入或經過東協境內時須公開通報。中國一直拒絕簽署的原因，是認為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會束縛解放軍在相關地區內的行動。<sup>⑪</sup>此後，儘管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 2006 年 10 月 30 日紀念中國和東協建立對話關係 15 周年的首腦會談中表示堅定支持《東南亞無核區條約》，並將簽署相關議定書，<sup>⑫</sup>但顯然仍有所顧慮，至今尚未簽署。

二是中國拒絕參與《關於禁止使用、儲存、生產和轉讓殺傷人員地雷及銷毀此種武器的公約》（簡稱《渥太華禁雷公約》）（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the Use, Stockpiling, Production and Transfer of Anti-Personnel Mines and on their Destruction, Ottawa Treaty）。2001 年 12 月 10 日中國代表團沙祖康在經修訂的《地雷議定書》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上強調：「那些安全環境較好，對殺傷人員地雷依賴程度低的國家，當可採取此種方式參與解決地雷問題的國際努力。我們支持並尊重《渥太華禁雷公約》締約國的主權選擇。但對那些安全環境複雜、對殺傷人員地雷依賴程度高的國家，由於自衛的需要，一時還難以放棄合法使用殺傷人員地雷的權利。」<sup>⑬</sup>中國雖然表面上是基於現實安全環境的考量而拒絕簽署該條約，但實際上應與國際壓力的大小有很大的關聯。據統計，截至 2010 年 4 月止，全世界有 156 個國家已加入《渥太華禁雷公約》，但在包括印度、美國及俄羅斯等 39 個國家仍尚未加入的情況下，<sup>⑭</sup>中國不會承受太大的國際壓力，因此參與的積極性也就不高。

## 伍、結 語

就新現實主義的角度而言，參與國際體系是實現國內經濟發展目標的手段，然而單一的國家利益分析視角容易將國際體系融入的過程簡單地理解為：存在利益並獲取

註⑩ 中國聯合國協會編，前引書，頁 63。

註⑪ 宋義達，「中國將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朝鮮日報，檢索日期 2006 年 11 月 1 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11/01/20061101000018.html](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11/01/20061101000018.html)。

註⑫ 同前註。

註⑬ 「中國代表團團長沙祖康大使在經修訂的《地雷議定書》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2001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china-un.ch/chn/cjfk/cjfyda/cj2001/t153198.htm>。

註⑭ 39 個國家中包含波蘭及馬紹爾群島等兩個已簽署（1997 年 12 月 4 日）但尚未完成國內批准手續的國家。“Ottawa Treaty,” *Wikipedia*, access on May 2, 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Ottawa\\_Treaty](http://en.wikipedia.org/wiki/Ottawa_Treaty).

利益或是有利則進、無利則退。<sup>⑩</sup>事實上，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使得一國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相互融合加快，愈益呈現複合與交錯的態勢。在對外關係中，以國家利益為前提所確立的國際責任，往往只有在符合國際規範、國際社會的利益需要和國際道義時，才能為國際社會所接受和認可。<sup>⑪</sup>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國家一旦融入了國際體系之後，即同時成為國際制度和組織中的一員，將不可避免地經歷某種程度的社會化過程，即便是最具實力的國家也無法做到僅從本國的國家利益角度出發，處理國際體系中的事務。社會化的過程促使國際體系的參與者不僅要從國家的角度，而且要從國際組織、國際制度以及整個國際體系的角度進行國家利益的再定義和外交政策的再調整。<sup>⑫</sup>換言之，如果說行為體進入某種社會化進程，可能是由於利益權衡，那麼一旦進入進程之中，就在整合和被整合。行為體雖仍然權衡利益，但利益的權衡並不意味著它可以任意脫離進程。<sup>⑬</sup>

綜觀中國參加國際裁軍及軍備管制建制的外交實踐，基本上，符合了上述的看法，也證實了本文的假設，中國在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領域上，通過交往互動的確受到國際規範的影響，並且產生規範擴散效應，符合建構主義強調的「規範→身分認同→國家利益→國家行為」之論述，進而漸進式地改變了中國的國家身分認同與國家利益，並直接反映在各階段的國家行為上；但刻正歷經社會化進程的同時，中國在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領域的行為表現，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受到國際現實環境制約，亦即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身分建構是在規範與現實下的抉擇，若用 Johnston 的概念來表述，中國在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領域的表現，就是學習（learning）與調適（adaptation）下的結果。<sup>⑭</sup>

註⑩ 例如西方學者 Gary Klintworth 在研究中國為何改變軍備管制政策時，認為國家形象只是重要因素之一，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免於國際的紛爭與衝突、跟隨日本的最低國防花費模式，將有限的資源聚焦於國內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建設等才是主要原因。此外，中國學者陳啓懋也認為國家利益的趨動是中國成為現行國際體系自覺、積極參與者和負責任建設者的根本原因，強調中國為了達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將中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目標，就需要一個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需要全方位對外開放，因此，必然且必須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和國際體系，並在其中發揮負責任的大國作用。Gary Klintworth, "China and Arms Control: A Learning Process," in Yongjin Zhang and Greg Austin ed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pp. 220-242; 陳啓懋，「國際體系和中國國際定位的歷史性變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6 期（2006 年），頁 37-38；李寧豫，「國家利益與國家角色：分析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兩種視角」，*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2 期（2003 年），頁 81。

註⑪ 王公龍，「國家利益、共有利益與國際責任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2008 年），頁 22。

註⑫ 李寧豫，前引文，頁 81。

註⑬ 秦亞青、魏玲，前引文，頁 10。

註⑭ 「學習」（Learning）與「調適」（Adaptation）是西方學者研究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推行的「New Thinking」政策（強調 Cooperative）所衍生出來的概念。Alastair Iain Johnston 首先將這兩個概念運用在中國軍備管制的研究上。「學習」係指內化了國外的一些個人或機構的新安全定義，並且透過個人轉變及組織發展將新的思維制度化在決策過程中。「調適」則是對相對能力下降等現實環境改變的理性調整，具有策略調整的性質。參見 Alastair Iain Johnsto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p. 27-31.



其次，從中國的現狀性、游離性與革命性等三種國家身分及其相應國際責任的轉變過程，可以明顯看出在革命性與游離性國家身分階段，中國於建制中的具體表現，是採取「實力政治」(realpolitik)，而不是「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途徑，同時，中國的行為中也有搭便車的因素存在。<sup>⑭</sup>然而，進展至現狀性國家身分時，伴隨著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步伐的，是中國的社會化學習和規則內化過程，以及由此導致的自我認知變化及其對自身國際形象的關注。<sup>⑮</sup>在此階段，隨著中國權力的增長，領導人在國際事務上更有信心，因而認為加入國際體系而不是試圖打破或者修正它，對於正在崛起中的國家利益是有益的。是以，綜觀中國近年來的行為和趨勢，體現了中國面對大部分世界事務的一種持續比較合作及妥協的態度。<sup>⑯</sup>顯然地，對於這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的參與，可以為擴展中國的國際空間提供制度性的資源，同時也有助於改善和提高中國的國際形象。

再者，「負責任大國」的表述不僅是外交辭令，其實也具有影響外交行為的實質意義。因為這樣的身分意識一旦形成，並經過領導人與學者們的反覆論述後，它便使中國漸漸有意識地將其列為對外政策的目標，並將與其有關的行為標準（建設性與合作型的行動）視為符合國家利益的規範，這對中國的外交行為起著制約的規則（regulative）作用；<sup>⑰</sup>而在實踐上，也通常會出現前述的「約束自己」或「自己預先承諾」行為。因此，當中國反覆實踐自我認可與他國肯定的負責任行為時，它同時也在貫徹建設性行為規範，而這個過程則反過來增強負責任大國的身分認同。但這並不表示中國在國際組織或建制上的行為會永遠處於被動的遵循立場，未來隨著國力的增長與利益的擴展，除了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之外，中國的角色也有可能從國際規範的遵循者慢慢調整為國際規範的提倡者，甚至是制定者。

最後，隨著中國的持續發展，承擔國際責任的期望和能力也隨之增加，中國日益期待自己被視為國際建制的積極而負責的參與者，而對被視為孤立、頑固的角色分外敏感。建設性、負責任的國際形象目標，就這樣在中國與國際建制的互動過程中建構起來。<sup>⑱</sup>然而，從中國加入國際裁軍與軍備管制建制的原因及合作質量來看，一方面，儘管初始帶有某種程度的不情願，但中國為了建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向全世界傳遞合作及負責的訊號，雖然面臨諸多的自我限制成本，但中國仍然選擇加入；但另一方面，國際壓力的大小也決定了中國參與此建制的程度與速度，當壓力不大，且涉及安全及領土等根本性利益時，中國也會選擇堅持自己的立場。準此，本文認為就國家身分而言，無疑地，中國目前明顯是屬於現狀國家，是體系的維護者，但就前述的

註⑭ Michael D. Swaine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and Arms Control Institutions," pp. 105~120.

註⑮ 門洪華，前引文，頁 17。

註⑯ Robert Sutter, "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1 (Winter 2003-04), p. 88.

註⑰ 郭清水，「中國參與東盟主導的地區機制的利益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2004 年），頁 59。

註⑱ 門洪華，前引文，頁 22。

國家身分認同三個等級而言，中國大陸目前已進入了第二級的「利益性認同」階段，然而，雖然在行為表現上帶有某種程度的「觀念性認同」特徵，但距離擔負國際責任的最高標準，即無需外力強制，也不用利益驅動的真正「觀念性認同」，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

\*

\*

(收件：98年8月14日，第1次修正：98年10月2日，三審：98年11月3日，  
第2次修正：99年1月22日，第3次修正：99年4月19日，接受：99年5月2日)

# China's Constructed Identity as a Responsible Pow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oreign Policy: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Arms Control Regime

*Kun-shuan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irect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ong-bo Huang*

Ph.D. Student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China's rise is a process of simultaneous increases in power, expansion in interests, and enlargement of responsibilities. China has been advoc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 of a "Responsible Power" since the mid-1990s. Yet, is China truly a responsible power? Does its word harmonize with its action? These questions can only be answered through meticulous examinations. The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Regime is the most sensitive security issues and is the best way to evaluate China's construction of its responsible-power image. Starting from a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ways in which China has shaped its im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the reasons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China's id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Keywords:** norm; identity; image of a responsible power;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national interest

### 參考文獻

- 「2008 年中國國防白皮書：軍控與裁軍」，中國新聞網，2009 年 1 月 19 日，<http://chinanews.sina.com/jczs/2009/0119/20213230874.html>。
- 「中國代表團團長沙祖康大使在經修訂的《地雷議定書》第三次締約國大會上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2001 年 12 月 10 日，<http://www.china-un.ch/chn/cjkk/cjfyda/cj2001/t153198.htm>。
- 「中國的軍控、裁軍與防擴散努力白皮書」，中國網，2005 年 9 月 1 日，<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sy/957526.htm>。
- 「中國與多國防擴散出口管制機制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2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410696.htm>。
- 「瓦塞納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320981.htm>。
- 「安理會第 1540 號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 年 5 月 21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320983.htm>。
- 「和平利用外層空間委員會 (COPUOS)」，人民網，2005 年 5 月 28 日，<http://world.people.com.cn/BIG5/8212/60991/61272/4273683.html>。
- 「武器貿易條約倡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8 年 2 月 29 日，<http://www.fmprc.gov.cn/chn/gxh/zlb/zcwj/t410717.htm>。
-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2007 年 10 月 25 日，<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
- 「胡錦濤在核安全峰會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0 年 4 月 14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679411.htm>。
- 「核裁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 年 7 月 27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tytj/t119261.htm>。
- 「核安峰會公報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0 年 4 月 14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679505.htm>。
- 「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日期 2010 年 2 月 22 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tytj/zcwj/t119270.htm>。
- 丁樹範，「中美關於太空、導彈與核武政策爭議之研究」，中國大陸研究，第 53 卷第 1 期 (2010 年 3 月)，頁 113~117。
- 三軍大學譯，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著，美國國防部軍語詞典 (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5 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中國外交 (1996 年版)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 年)。
- 中國聯合國協會編，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有關會議發言匯編 (1999 年)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年)。



- 中國軍控與裁軍會議譯，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編，  
SIPRI 年鑒 2008：軍備、裁軍和國際安全（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
- 王君，「冷戰後中國不擴散政策的轉變及其原因分析」，太平洋學報（北京），第 4 期  
（2002 年），頁 61~71。
- 王軍、林民旺譯，Avery Goldstein 著，中國大戰略與國際安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8 年）。
- 王公龍，「國家利益、共有利益與國際責任觀」，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  
（2008 年），頁 22。
- 王超，「當代中國身分定位的演變對其參與國際合作的影響」，中國國際關係學會編，  
國際關係研究：合作理論及爭鳴—2008 年博士論壇（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9 年），頁 199~211。
- 牛海彬，「『中國責任論』析論」，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3 期（2007 年），頁 48。
- 朱鋒，彈道導彈防禦計畫與國際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安儲，「2004 年國際生物、化學武器控制與裁軍綜述」，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主編，  
2005 年度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報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頁  
109~113。
- 刑悅、詹奕嘉，「新身分·新利益·新外交—對中國新外交的建構主義分析」，現代國  
際關係（北京），第 11 期（2006 年），頁 19~21。
- 李小華譯，Peter J. Katzenstein 著，文化規範與國家安全：戰後日本警察與自衛隊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 年）。
- 李寧豫，「國家利益與國家角色：分析中國與國際體系關係的兩種視角」，太平洋學報  
（北京），第 2 期（2003 年），頁 81。
- 李寶俊、徐正源，「冷戰後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的建構」，教學與研究（北京），第 1 期  
（2006 年），頁 49~52。
- 李慧明，「國際社會的負責任大國：當代中國的身分訴求與實踐建構」，國際關係學院  
學報（北京），第 1 期（2008 年），頁 26。
-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99 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
- 何高潮等譯，Tang Tsou 著，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
- 肖歡容，「中國的大國責任與地區主義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46~47。
- 宋義達，「中國將簽署《東南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朝鮮日報，檢索日期 2006  
年 11 月 1 日，[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11/01/20061101000018.html](http://ch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11/01/20061101000018.html)。
- 沈丁立，「核擴散與國際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8 年），頁 11。
- 余建軍，「身分、規範與利益：理解中國國際制度行為轉變的理念途徑」，世界經濟與  
政治（北京），第 3 期（2009 年），頁 11。

- 周寶根，「中國與核不擴散機制的一種建構主義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2 期（2003 年），頁 25~26。
- 門洪華，「壓力、認知與國際形象：關於中國參與國際制度戰略的歷史解釋」，*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4 期（2005 年），頁 17~22。
- 袁易，「中國與導彈建制：國際規範之挑戰與遵循」，*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3 期（2004 年 5、6 月），頁 127。
- \_\_\_\_\_，「對於 Alexander Wendt 有關國家身分與利益分析之批判：以國際防擴散建制為例」，*美歐季刊*，第 15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275~281。
- \_\_\_\_\_，*中國遵循國際導彈建制的解析：一個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台北：五南圖書，2004 年）。
- 秦亞青，「國家身分、戰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一種關於中國與國際社會關係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10~11。
- \_\_\_\_\_，*權力、制度、文化：國際關係理論與方法研究文集*，第 3 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
- \_\_\_\_\_、魏玲，「結構、進程與權力的社會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3 期（2007 年），頁 10~11。
- \_\_\_\_\_、朱立群等譯，Bruce Jones and Carlos Pascual 著，*權力與責任：構建跨國威脅時代的國際秩序*（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 年）。
- 馬振宇譯，Robert G. Joseph 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之回顧」，William H. Lewis and Stuart E. Johnson 主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反擴散的新展望*（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 年），頁 7~8。
- 孫溯源，「集體認同與國際政治：一種文化視角」，*現代國際關係*（北京），第 1 期（2003 年），頁 41。
- 夏立平，*亞太地區軍備控制與安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 徐正源，「權力與責任：冷戰後中國負責任大國身分的建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主編，*復旦國際關係評論*第 8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42。
- 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8 期（2004 年），頁 78。
- 陳怡凱、陳思齊譯，Marie I. Chevrier 著，「強化國際軍備管制機制」，Raymond A. Zilinskas 主編，*生物戰的攻擊與防禦*（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頁 201、206 及附註 53。
- 陳啓懋，「國際體系和中國國際定位的歷史性變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第 6 期（2006 年），頁 37~38。
- 郭清水，「中國參與東盟主導的地區機制的利益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 9 期（2004 年），頁 59。
- 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北京大學出

- 版社，2006年）。
- 楊永明，「國際限武裁軍機制與規範：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法規範之檢驗」，*問題與研究*，第43卷第3期（2004年5、6月），頁81~89。
- 溫家寶，「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人民日報*（北京），2006年4月4日，第3版。
- 趙紫陽，「在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新華網*，2004年10月19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914.htm](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9/content_2108914.htm)。
- 潘振強，*國際裁軍與軍備控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年）。
- ，「試論國際制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及中國的對策」，*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第8期（2006年），頁11、434。
- 樂為良、黃裕美譯，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著，*重估中國崛起：世界不能不知的中國強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 劉杰，「走向負責任大國：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定位及路徑選擇」，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編，*負責任大國的路徑選擇*（北京：時事出版社，2007年），頁22。
- 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1949-1979）*（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
- 龐中英，*中國與亞洲：觀察·研究·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
-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ccess on March 30, 2010, <http://www.defense.gov/>.
- “Ottawa Treaty,” *Wikipedia*, access on May 2, 20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Ottawa\\_Treaty](http://en.wikipedia.org/wiki/Ottawa_Treaty).
- Armstrong, David,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Acharya, Amitav,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s?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Spring 2004), pp. 239~275.
- Bull, Hedley, *The Control of the Arms Race: Disarmament and Arms Control in the Missile Age*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1).
- Berger, Thomas, “Norms, Ident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Germany and Japan,”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7~345.
- Checkel, Jeffery T., “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2 (January 1998), p. 326.

- \_\_\_\_\_, "Norms,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emporary Europ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1 ( March 1999 ), p. 87.
- Cupitt, and Murayma, "Export Contr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lletin of Asia-Pacific Studies*, No. 9 ( 1999 ), p. 25.
- Chan, Gerald, *China's Compliance in Global Affairs: Trade, Arms Contr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man Rights* ( MA: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6 ).
- Finnemore, Martha,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
- Frieman, Wendy, *China,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 Goldstein, Avery, "Robust and Affordable Security: Some Lessons From the Second-ranking Powers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15, No. 4 ( December 1992 ), p. 494.
- Garrett, Banning N. and Bonnie S. Glaser,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Nuclear Arms Control,"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East Asian Security* (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6 ), pp. 227~233.
- Gray, Richard, "Nuclear Weapons Proliferation," in Craig A. Snyder ed., *Contemporary Security and Strategy* ( Hampshire: Macmillan, 1999 ), pp. 171~193.
- Gill, Bates,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Nonproliferation and Arms Control Policy-making in an Era of Reform," 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 1978-2000* ( 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p. 259~264.
- Gormley, Dennis M. and Richard Speier, "New Missiles and Models for Cooperation," in Henry Sokolski ed., *Taming the Next Set of Strategic Weapons Threats* (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6 ), pp. 139~140.
- Harding, Harry,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 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1984 ), p. 184.
- \_\_\_\_\_,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Janne E. Nolan ed., *Global Engagement: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4 ), p. 425.
- Herman, Robert G., "Identity, Norms,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Soviet Foreign Policy Revolution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271~311.
- Hua, Di, "Threat Perception and Military Planning in China: Domestic Instabil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estige," in Eric Arnett ed., *Military Capacity and the Risk of War: China, India, Pakistan and Ira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p. 28~31.
- Hopf, Ted,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 Security*, Vol. 23, No. 1 ( Summer 1998 ), pp. 174~175.
- Jepperson, Ronald L.,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p. 54~59.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 Explaining Change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China Journal*, No. 35 ( January 1996 ), pp. 27~34.
- \_\_\_\_\_,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 \_\_\_\_\_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pp. 240~242.
- Kent, Ann, "China's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lobal Governance*, Vol. 8, No. 3 ( July/September 2002 ), p. 350.
- Kissinger, Henry, *A World Restored* ( New York: Crosse and Durrill, 1964 ).
- Klintworth, Gary, "China and Arms Control: A Learning Process," in Yongjin Zhang and Greg Austin eds.,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 pp. 220~242.
- Krasner, Stephen D., "Structural Cause and Regime Consequences: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 Spring 1982 ), p. 186.
- Lewis, John W. and Xue Litaim, *China Builds the Bomb*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New York: Norton Company, 2001 ).
- Medeiros, Evan S., *Reluctant Restraint: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1980-2004* (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_\_\_\_\_ and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 November/ December 2003 ), p. 23.
- Ness, Peter Van, "China and the Third World: Patterns of Engagement and Indifferen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 p. 154.
-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Proliferation: Threat and Response* (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1 ).
- Pilat, Joseph F. and Robert E. Pendley, *Beyond 1995: The Future of the NPT Regime* (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0 ).
- Price, Richard and Nina Tannenwald, "Norms and Deterrence: The Nuclear and Chemical

- Weapons Taboos,”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42~145.
- Sagan, Scott D.,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3 (Winter 1996/97), p. 76.
- Swaine, Michael D. and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and Arms Control Institutions,” in Elizabeth Economy and Michel Oksenberg eds., *China Joins the World: Progres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pp. 101~120.
- Sutter, Robert, “Why does China Matt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1 (Winter 2003-04), p. 88.
- Srivastava, Anupam, “China’s Export Controls: Can Beijing’s Actions Match Its Words,” *Arms Control Today*, Vol. 35, No. 9 (November 2005), p. 20.
- Thomas, Raju G. C., “The Renewed NPT: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in Raju G. C. Thomas ed., *The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Prospects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1999), pp. 5~6.
- Thomas, Ward, “Norms and Security: The Case of International Assassin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 121.
- Waltz, Kenneth 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Wendt, Alexander,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Zoellick, Robert B., “W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at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